

导 言

人首先是理性的存在物，惟有人才有理性；同时，人也是非理性的存在物，惟有人才有情感、直觉、意志和信仰。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人类的历史之所以色彩斑斓、跌荡起伏，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之所以丰富多彩而又富于个性，历史之所以成为“人”的历史，社会历史活动之所以成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关键在于：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完整的人”。在属人的世界中，不存在纯粹的理性与非理性，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交融、相互批判、相互依存，不可分离。

在浩瀚磅礴的西方哲学发展史中，作为主流的理性主义哲学，长期以来一枝独秀，一脉相承，先后经历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客观理性，近代哲学的认知理性、主观理性、工具理性及黑格尔的绝对理性等各种不同的理性形式。尽管各个历史时期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有一点则是相同的，即把理性抬高到了高于一切的位置。然而，理性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却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家建立以人而不是以神为哲学中心的初衷相悖。随着传统形而上学理性主义哲学的形成，人们只能在思辨的理性中对人的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之间进行还原与探求，从而割裂了人的完整性，消弭了人的鲜活性。人们在摆脱了神学与经院哲学的束缚后，却又受到思辨形而上学体系的束缚。近代理性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

缺陷的本质在于：理性离开了人性，人的存在被抽象化为理性的化身，世界变成了由人的理性所构建的世界。当着哲学家用这样的理性去建构关于人与世界的哲学体系时，这种哲学则成了与人的现实生活相分离的形而上学的思辨理性哲学。理性主义的这种遭遇在于它过于注重了理性的思辨性和工具性，而忽视了理性的属人性。理性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这一内在致命的缺陷必然导致其对立面——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产生。

以叔本华为代表的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与传统理性主义反其道而行之，但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现代非理性主义的过度膨胀是对理性主义进行反思的畸形结果。非理性主义的错误不在于它指出了在人性结构中存在着非理性因素，也不在于它肯定了这些因素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而是在于它把非理性的“自我”、“意志”、“生命冲动”、“直觉”看做是世界的本原，把非理性的情欲、冲动、本能当成了人的本质，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原则。非理性主义的另一重要失误在于它的极端片面性，即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抽象地看待理性一样，也脱离了人的社会实践，离开诸种社会关系和具体的历史条件，抽象地、孤立地看待非理性。非理性主义者不懂得要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和改造客观世界来扬弃自然、社会和人所面临的矛盾与危机，而是强调通过回归人的内心的非理性体验来解决危机。非理性主义贬低人的理性，把非理性提高到支配一切的首要地位。非理性主义用纯生物的观点来看待人的一切，分析人的一切，不是用社会历史的观点来研究人的心理现象，而是单纯用心理分析理论去阐释社会历史现象，其实质是将社会的东西心理学化，将心理的东西生物学化，消解了人的存在的社会维度，从而把人降低到了生物学意义上的人。

传统理性主义与现代非理性主义各自的缺失，向我们提出

了重要的问题：如何看待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如何评价和认识非理性的价值和作用？对这些问题的阐释与应答，也正是本书的初衷和旨趣。

本书从多维的视角出发，在分析和阐述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互批评、彼此消长、不可分离的关系基础上，探求非理性因素之间的整合关系、结构、机制及其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价值和作用。

本书从哲学历史演进历程的视角，探寻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在从原始思维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就犹如一个整合的统一体而不可剥离。在人类精神发展的漫长过程中，不论理性是沉沦还是高扬，非理性都以不同的存在形式相伴随；不论理性的内涵发生怎样的变化，非理性作为人的存在因素均构成理性存在的基础；不论理性在其发展过程中走向绝对还是抽象，非理性则会出来相助，亦或批判亦或消解。在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虽然理性与非理性多次易位、此消彼长，但是两者在存在形态和表现形式上却是相互补充的。在原始思维中理性与非理性是混沌地统一着；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理性与非理性虽在精神层面发生分化，但却在现实的层面上统一起来；在中世纪哲学中伴随着理性的沦落，非理性的信仰以理性化的形式占领了人类精神的统治地位；在近代哲学中，伴随着理性的一路高扬与走向终结，非理性又以人的主体性的存在形式表现出来；在当代哲学中，伴随着理性逐渐走向抽象化和绝对化，非理性又义不容辞地对形而上学的理性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消解，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非理性主义的理论形态及非理性因素都是以理性的形式表现的。由此可见，理性与非理性是不可分割的，离开

了理性的非理性与离开了非理性的理性都是片面和贫困的。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就是理性与非理性整合的历史，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相互对立、相互统一、彼此消长、两者共存的历史。理性与非理性的整合性并不意味着两者地位的均衡性。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理性是人类精神发展过程中的主流，非理性是支流。理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理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表征，理性代表着人类精神发展的趋势。人类历史的进步靠的不是人的本能的增强，而是人的理智能力的提高，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每一次提高和飞跃，都会给人类和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变化，这一点是无可置疑和不可辩驳的客观事实。

本书以对非理性特性及结构的研究为视角，探求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本书对非理性研究的理论前提是在以理性为主导的基础上，从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视角来研究和探寻非理性因素的特性、结构和机制。人类社会的任何精神现象和社会行为都不可能是单纯的理性在独立地发挥作用，而是理性与非理性相互契合、补充、合作的结果。认识人的本性，既不能离开人的知识、理想、意识、道德等理性活动，也不能撇开人的本能、欲望、意志、情感等非理性活动，否则就不可能准确地、完整地、辩证地把握人性。作为人的意志、信仰、直觉、灵感等非理性因素是与理性十分接近的，它们作用的机理及结构构成使它们离不开理性，受理性的制约和指导，随理性的变化而变化，以理性的水平为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性是非理性因素发挥作用的基础。然而，作为单独的非理性因素本身也并非孤立地存在着。从横向的角度看，非理性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有机的整合体；从纵向的角度看，非理性因素又因与理性关系的亲疏程度不同分为高、中、低不同的结构层次，并与理性一起，发挥着正面

与负面的作用。

本书以对非理性因素在人的认识中的作用为视角，分析和阐释理性与非理性关系及非理性的价值。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是一个完整的人，因此对于认识及认识过程的考察，不仅从理性的角度进行，而且也必须从非理性的方向上展开，即从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中考察认识及其认识过程，从而改变以往对认识及其过程的理性的单一向度的研究，由此开拓了认识论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对于认识活动中非理性因素的研究，将具体地揭示人的认识的能动作用。在以往的认识论中，认识的主体性被淡化了，能动的反映论并没有充分地揭示出反映的能动性，以至使认识论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社会实践的要求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非理性因素作为对认识主体内心体验的反映，在认识发生、认识发展、认识飞跃的过程中，时时刻刻伴随着认识主体参与认识，并对认识起着推动、影响和制约作用，并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决定性的作用。可见，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是认识主体能动性的具体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否认了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也就否认了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对非理性因素的研究，将会进一步揭示人的认识机制。因为构成人的认识机制的不仅是理性因素，还有非理性因素，只有二者在认识过程中的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交融才能使人的认识既深刻、睿智，又生动、具体，才能使认识成为真正的“人”的认识。

本书以对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为视角，揭示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及非理性的价值。生活在社会历史中的人是多种属性相统一的存在物，因而也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理性是历史活动中的人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日益理智化的产物，但理性并不能构成人的完整的能动力量，这是因为人在社

会活动中首先必须作为感性实体与外部的世界发生联系，它是建立在直观、情感和欲望之上的东西，“理”乃“情”之所系。因此，处于历史活动中的人，既不是“纯粹”理性的人，也不是“纯粹”非理性的人。人的实践活动是理性和非理性统一的基础。人作为现实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本身就是理性与非理性对立统一的社会性存在。作为人的精神因素的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动力作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初起阶段，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现今时代，人的欲望、需要、情感、意志、信仰等非理性因素内化为人的意识，以利益的追求为中介，以交往为形式，以生产为手段，实现着自身的目的和意志，这种达到目的的过程则构成了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

本书以对非理性因素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作用为视角，探究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及非理性的价值。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实践主体固然要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约，具有受动性。但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对象目标，实现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的愿望和需要，又总是力图从主观方面通过一定的理性认识与手段和非理性的内心体验去支配和控制这些外部的影响和刺激，并有一种能够实现这种支配与控制的信念与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促使实践主体产生非理性的情感、信仰及意志力量，从而构成人的实践活动的能动性。人的非理性因素作用于具体实践活动的各个环节，并最终通过实践结果得以外化、对象化。换言之，非理性因素在实践活动中的作用是通过实践目的、手段和结果的反馈调控过程而实现的。

非理性及其价值研究具有理论与现实双重意义。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研究非理性

及其价值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人类哲学考察和探究理性及其本质自古希腊罗马哲学以来已有几千年之久，近代自笛卡尔以来也已有五百余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先哲们对理性本身及其与之相关的各个方面都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揭示，可以说人类对理性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了“综合认识阶段”。然而，与之相比，人类对非理性的研究始于叔本华，形成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上半叶，至今只有 100 多年的历史。这就决定了人类对非理性的研究还处于基本的、初级的“分析认识阶段”。人类精神的发展史告诉我们，虽然理性与非理性是相伴随而存在着，但是对非理性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这促使着我们进一步加强、深化对非理性及其价值的研究，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因此展开对非理性与理性关系的深入研究，打破和改变我国目前理论界只限于对非理性各因素的独立分解研究、视角单一的研究的局限和现状，应成为我国理论界对非理性进行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开展对非理性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不仅研究非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还要研究非理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作用以及在管理活动中的作用；不仅要研究非理性的各因素的作用，还要研究非理性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非理性各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构、作用机制和作用规律，以及与非理性因素和理性因素作用相关的方方面面。加强对非理性的上述理论研究，无疑对拓展和深化非理性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对非理性研究理论意义的另一个方面表现为：将有助于深化对认识论及历史观的研究。人的社会历史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性范畴，既包括认识世界的活动，也包括改造世界的活动。认识和改造世界活动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史上长

期未能得到正确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理性主义片面强调理性因素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的至尊地位而竭力贬低非理性，认为非理性因素是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活动中所犯错误的根源；与此相反，非理性主义则片面强调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的至尊地位而竭力贬低理性。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都是从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中抽取某一方面加以夸大和绝对化。在实际的认识和社会历史运动过程中，不存在纯粹的理性因素或纯粹的非理性因素，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是彼此交织、彼此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在认识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理性起支配、定向和指导作用，非理性起动力、诱导、激发作用，理性因素要靠非理性来激活、发动、催化和贯通。因此，深入研究非理性与理性在认识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对于深化认识论和历史观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对非理性及其价值的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现实意义。

研究非理性因素在认识和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现时代的要求。20世纪中叶以来，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展开。新的科技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引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给人类带来了福音；另一方面，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负效应，如生态危机、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等全球问题。在这场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各国之间以经济竞争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尤为激烈，而综合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家人才的培养和人的素质的提高。人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尤为突出，而人的素质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除了其生理素质和社会素质外，还有精神素质。而精神素质主要指理性因素和非

理性因素。人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包括非理性因素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而非理性因素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尤为显著。当前，个性的扭曲、环境的恶化、精神的堕落、人性的异化等均是一些非理性因素消极作用使然，使其积淀为一些人的生态态度和价值取向。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研究非理性问题，对于澄清非理性主义夸大人的非理性、贬低人的理性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正确认识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积极与消极的双重作用，并在现实中强化其积极作用，克服和削弱其消极作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对于解决当前我国因改革开放、社会巨变而引发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公平和效率、市场和秩序等一系列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后迪意义。

研究非理性因素在认识和社会历史实践中的作用的目的在于科学地认识非理性因素，使之与理性因素相协调、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相适应，这无疑有助于人们更主动更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从而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对于培养和发展人的非理性因素，使人性逐步完善和完满起来十分重要，因此，研究非理性及其价值，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非常必要的，这同样也是历史和现实赋予我们的任务。

上 篇

整合：理性与非理性 的双重变奏

第一章

理性与非理性的原始统一

鸟瞰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我们不仅要为理性和科学的成就而欢呼，同时也为理性和科学的沉沦与堕落而悲哀。在这人类漫长而悲壮的跋涉进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宏大的人类情感的潜流。人类的精神史，不仅是一部理性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情感的发展史、一部非理性的发展史，也就是说理性的历史有多长，非理性的历史也有多长。人类自身进化的初始过程则更能说明纯粹的理性和非理性是不存在的，人类正是从“不理性”状态，逐步达到了理性的境界。本章从发生学的角度，通过对原始精神和原始思维进化过程的分析来探求理性与非理性的共存与整合。

一、原始精神中理性与非理性的混沌统一

原始精神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它是指人的原始思维及人类早期的情感、本能、需求等一切最基本、最低级的生理和心理现象的总和。人类早期的理性与非理性是在原始精神中混沌地统一着的。当然，此时人类的理性和非理性与现时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含义是不完全相同的，那时它们仅仅作为人与动物的连接点而存在，这一连接点就是人的生存本能及人的情感、

欲望、需求及其对象化的过程。人类精神和个体精神的最初发生，既不是纯粹理性的也不是纯粹非理性的，而是理性和非理性的混沌统一。在这种理性和非理性的混沌统一中，主体不能自觉地把自我和对象区分开来，只有主客两忘、主客交融的混沌意识^①。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关系不仅具有共时性整合结构，而且具有历时性整合结构，它们之间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社会化整合过程。”^②

这一整合过程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非理性是理性产生的前提和基础

在人类精神的初始阶段，在原始人那里，人类的理性和非理性是互相搀和、浸润在一起，并以萌芽的形式存在着的。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始出于他们的生存本能、情感及需要。在求生存的过程中，他们打制的石器虽然十分简陋粗糙，但已经是事物的尺度和人自身内在尺度的实际统一，是人类理性（知识和技能）与非理性（欲望、意志、情感和幻想）的统一。制造和使用工具是受人的一定的欲望和意愿支使的，这种欲望、意愿带有追求理想的性质，它间接、曲折地反映了原始人肉体生命的需要。人们千百次地根据自身生存的需要和情感的需要而制造简陋粗糙的工具，在此基础上人类积累了生存、生产的经验，正是在这些原始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人们运用混沌的思维和粗浅的技能制造和使用工具实现了自身的理想，满足了自己

^① 吴宁著：“非理性发生的社会基础及其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作用”，《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6年第4期。

^② 夏军著：《非理性世界》，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页。

的需要。因而，工具是物化的知识力量，是人类理性的表现。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体现了人类理性的技巧。可见，在人类精神初始阶段，人的理性是以人的本能意识，即人的生存需要和情感为基础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上述的非理性情状，出现在理性之前。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非理性，就没有理性，理性的存在是以生命的存在为前提的，是以人的需要和情感为基础的，没有生命则没有理性，没有作为人类的需要和情感的的非理性，理性则不可能成为人的对象化的产物，非理性是理性产生的前提和基础。

（二）理性与非理性不自觉的统一

在人类精神进化的漫长过程中，原始人对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并不像现代人这样明晰和自觉。那时的理性和非理性都是人们精神结构和功能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人们也很少将两者对立起来^①。在原始社会初期，由于人类的生存与生产能力的低下，原始人并不能全部实现其欲望、需要、意志和理想，在未知的不可抗拒的异己的自然力面前，他们常常流露出失望和焦虑的情绪，对之充满了恐惧、神秘的感情，并幻想通过运用一些方法和手段控制这些异己的自然力，由此而产生了最初的宗教情感和巫术活动。原始人在自然现象面前表现出的无能为力，表明了他们的理性意识是备受压抑的，这就是原始万物有灵意识起源的基础。从这一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出，对原始意识起主导作用的，“与其说是观念和推论，毋宁说是情绪、激情以及无意识的、冲动性的和反射性的行动；而观念则是继之而生的现象，是施之于业已司空见惯的

^①韩震：《重建理性主义信念》，北京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9 页。

种种激情和行动的某种领悟。”^①这表明此时人们的理性意识还未获得独立自存的地位，它作为一种日益发展的潜力还与粗糙的感觉、本能和想象纠缠在一起。在原始人的心目中，世界是一个混沌存在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人和物、人和人、物和物之间有一种神秘的互通与互渗的力量，正是通过这种神秘力量的支配才使宇宙万物联系起来，在这种神秘力量的支配下，世界没有彼此和你我之分。人的精神或意识还是作为某种朴素的整体机能而存在的，人们还不善于通过理智来思考问题，并对意识中的现象进行取舍。原始人往往对自己的一切感觉和意念，连同幻觉、梦境、咒语、错觉在内，统统信以为真。在原始人头脑中，非理性的东西与理性的东西还是不自觉的、无目的、无意识的，因而也不是相互排斥地存在着的。这正如前苏联学者克雷维列夫所说：“原始人的整个智力活动带有情感冲动的性质”。因此，“不能想象原始人在神经上和心理上是稳定的。……由于生活条件的艰难竭蹶，由于种种危险和灾害从四面八方袭来，由于这类原因，原始人在神经系统上持续不断的蒙受创伤。因此，……在原始社会的人们当中，无论心理病患者，还是喜怒无常者，较之社会发展的以后阶段，比例都要大得多；……总之，原始人的情绪波动非常之大，这点由于逻辑思维的稚弱而益烈；逻辑思维只有发展到高级阶段，才能在理性的控制下把情感纳人心平气和的轨辙。”^②可见，在原始人的精神世界里，理性与非理性，思维和意识，实质上是处在以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为基础的“自我中心”状态

① 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② 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6页。

之中，它们不自觉地、无意识地统一于人的存在本身。

（三）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是宗教与科学共生的基础

人类原始精神中的理性与非理性混沌的、不自觉的统一，使人不能自觉地把自我和对象区分开来，因而形成了主客不分、主客交融的非自觉的混沌意识，在这种混沌的意识中，宗教巫术和科学知识又相互交杂在一起，从而为后来的宗教与科学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提供了一块厚实的土壤。

一些人类学家认为，上古时期的巫术是从能表达人的情感、欲望、幻想的“交感”巫术开始。原始的巫术观念认为，同类事物是可以感应相生的。正是在这种想象和情感的支配下，人们不惜耗费大量体能去模仿一些自然过程，以企望现实的自然界按照人的意愿发生变化。譬如原始人发现蛙鸣则雨这一现象，于是天旱时，原始人就扮作青蛙鸣叫，希望求得雨水。对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而言，原始人类的这一举动纯粹是愚昧迷信的，然而，在当时这种巫术观念中也含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即自然界的运动是有规则的，人可以通过适当的形式去控制和利用自然，这显然已孕育了科学的胚胎和理性的萌芽。在上古的一些宗教活动中，如占星术、炼金术，用香料和药料保存尸体等等，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科学经验和科学知识，为以后天文学、化学、药理学、解剖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宗教（非理性的信仰）就是最原始的科学。

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看，宗教和科学的产生，均起源于人类依自身的情感、欲望、幻想对自然界的观察和认识。宗教和科学最初的出发点，都是想回答人们对自然界一些迷惑不解的问题。如宇宙、生命和人类是上帝创造的，还是物质世界长期